

在“守道”与“求变”中 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朱继东 李建鑫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十五五”时期是更好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关键期。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既要坚定道不变、志不改的信心和决心,又要适应时代发展变化,主动识变应变求变。”文化以“守道”为体,以“求变”为用,守其道而不泥古,革其新而不离宗,国家方能以文化的强盛立于世界之林。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始终贯穿着“守道”与“求变”的辩证统一,从学理层面深刻认识和把握“守道”的本质规定、“求变”的时代要求,进而探索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实践路径,能够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夯实文化根基。

何以“守道”:筑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与魂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道”即事物自身运动变化的规律和法则。在文化哲学中,“道”主要指文化发展的根本规律与精神内核,而“守道”则是对这一规律与内核的主动守护和实践传承,构成文化存续与发展的核心命题。“守道”是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性前提,失去这份坚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守道”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文化发展客观规律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然之道,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既扎根于中华民族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又遵循了文化源于实践、服务实践的发展规律,更立足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复兴的具体实践,它使文化建设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紧密联结。其既不是脱离实际的文化空想,也不是照搬西方的文化依附,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文化呈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本质上就是坚守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中国坐标,确保文化的发展建设不偏离社会主义方向、不脱离中国文化根基和中国具体国情,这为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根本道路遵循。

“守道”须坚持魂脉同根脉的辩证统一。党

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植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魂即文化赓续传承的精神、核心,根即文化赓续传承的根本、源泉,魂定方向,根供滋养,共同构成文化自觉生成与演进的生命体。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它为文化发展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引,构成了新时代文化发展的魂脉,背离这一魂脉将脱离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航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和最深厚的文化底蕴,构成了新时代文化发展的根脉,背离这一根脉则会使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激荡中丧失身份标识。从二者关系看,马克思主义激活了民为邦本、天下大同等优秀传统思想的时代生命,并推动其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相契合,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厚植文化土壤,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以魂塑根、以根育魂的文化演进逻辑中得以发展繁荣。

“守道”须巩固和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文化主体性是一个民族在文化层面的自我确证,在文化发展中保持精神独立的主体支撑,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显著文化标识。近代以来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抛弃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全盘西化”必然导致文化主体性和精神独立性的丧失。新时代,世界文化的交流交往交融日益频繁,文化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时有存在和中华文化软实力亟须提升的文化发展现状,对巩固和高扬中华文化主体性提出新的时代要求。立足新时代文化发展实践,既要保持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色,又要积极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还要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以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巩固和高扬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以何“求变”:识别和顺应新时代文化发展的新变化、新要求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是事物突破发展困境、实现自身存续的必然路径,“求变”

彰显着文化的生命特质、呈现了文化的发展规律,是文化适应时代、引领时代的关键。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这就需要准确把握新时代文化建设中的深刻变革、困境难题及战略抉择,以“求变”谋创新,繁荣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求变”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文化发展必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要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也要精神财富极大丰富、在思想文化上自信自强。”文化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并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变革而不断更新,这也就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实践需要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与之相适应。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入推进,现代化发展对文化赋能的需求日益迫切,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精神文化生活的期待值不断提升。如果文化依然固守传统而未实现新的发展,将难以发挥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精神支撑、价值引领功能。对此,只有以“求变”之姿推动“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才能在新时代的文化实践中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为实现社会现代化厚植精神文化支撑。

“求变”是破解新时代文化传承发展困境难题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深刻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背景下,文化强国建设仍存在不少短板和不足,必须高度重视,认真研究解决。”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中,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保护力度仍不足,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能力仍欠缺。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实践中,部分文化产品与群众需求脱节、文化业态创新滞后于科技发展,数字技术赋能文化的潜力尚未充分释放等问题也严重制约着新时代文化建设。破解依然存在的困境难题,需要以“求变”打破传统文化发展的惯性思维模式,通过创造性转化让传统文化“活起来”、通过创新性发展让先进文化“强起来”,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实际需求。

“求变”是增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战略抉择。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然伴

随着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影响力的增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具有强大的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并强调要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这就要求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既要“向内扎根”以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又要“向外生长”以提升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但在当前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现实实践中,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与经济硬实力相比还略显不足,“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等现象依然存在,敌对势力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抹黑、攻击、渗透依然不容小觑。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以“求变”的决心推动实现中华文化的现代化、国际化传播,彰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国际上的文化魅力。

实践进路:在“守道”与“求变”的辩证统一中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守道”是“求变”的根基,规定了文化创新的根本方向,“求变”是“守道”的延伸,赋予文化发展以创新活力。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深刻把握“守道”与“求变”的辩证关系。

以“第二个结合”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创新活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第二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马克思主义是文化强国建设的灵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独特精神标识,二者在思想观念、价值理念、道德信念等层面存在深度契合。“第二个结合”开启了文化创造创新发展的新空间,开辟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理论融合的新路径,共同构成了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深厚支撑。深入推进“第二个结合”,要挖掘、保护和整理好文献、遗迹、典故等历史文化资源,研究阐释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哲学思维、人文精神、价值理念等层面的共通共融之处,以现代化的学术、话语体系和辩证、系统、创新的思维方式推进二者的深度结合。同时,要借助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通过拓展数字文化产业、开发数字文化产品等方式,为新时代文化的发展开辟创新空间。

以进一步推进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激活新时代文化创新发展动能。改革是事物“求变”的内生动力,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关键所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产业。这充分彰显了党中央以“求变”推动文化发展繁荣的信心和决心。要坚持破立并举,聚焦意识形态领域的关键节点、疑难问题,完善舆论引导和舆情应对体制机制,引导人民群众正确辨析各种错误思潮,营造风清气正的宣传思想文化生态。同时,要通过深化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健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机制、丰富优质文化资源,以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健康繁荣发展增强人民对优质文化的获得感、幸福感。此外,还应强化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培育一批兼具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的文化人才,为文化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以创新话语体系与传播方式提升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凝聚力、感召力、影响力、引领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作为负责任大国,我们必须更加主动地宣介中国主张、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国形象。”面向世界提升中华文化的影响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是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要求,只有创新话语叙事和传播体系,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文化传播话语,才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好中国形象。要深入挖掘和提炼中华文化中具有普遍价值和吸引力的文化理念,不断探索更易被接受的跨文化海外传播模式,着力打造适应海外受众文化需求的文化产品。要以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和平性批判和否定“文明冲突论”等主张,继而打破西方的文化霸权和文明霸权,增强海外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认可和赞扬。要进一步加强传播载体建设,着力突破西方对中国的媒体封锁线,努力彻底破解西方媒体主导地位下中国失语、失声的传播困境,持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

(作者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

张治夏

吟、无魂的躯壳”的虚空状态,获得了最坚实的根基、最真挚的情感和最昂扬的灵魂。

新大众文艺的温度,源于对生活本真的坚守。“外卖诗人”王计兵用诗句记录奔波中的感悟,“田鼠大婶”裴爱民用文字描绘乡村变迁,保洁阿姨在备忘录中书写“毛茸茸的生活质感”,退伍军人以脱口秀纾解人生困惑——这些创作者没有经过专业的艺术训练,却以最质朴的表达,将普通人的奋斗、悲欢、梦想熔铸为文艺作品,书写出热气腾腾的“时代日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新大众文艺以粗粝而鲜活的叙事,让文艺回归人民、服务人民,在共情共鸣中凝聚起奋进力量。

一、人民性为魂:文艺扎根生活沃土彰显温度

新大众文艺的生命力,深植于最广大人民火热生活的丰沃土壤。它突破了传统文艺“少数人创作、多数人欣赏”的固有模式,其脉搏与街头巷尾的烟火气同频,其韵律与田间地头的劳作声共振,其光影与城市街巷的奔波身影交织,从而构建起一个“人人能创作、人人能参与、人人能共享”的沸腾文化现场。正是人民性的根本属性,使得新大众文艺告别了“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

二、民族性为基:文化基因焕发生机彰显深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新大众文艺的深厚底蕴,正在于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其作品内

在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神内核,彰显着刚健清新的中国精神。

创新不是简单的形式嫁接,而是对文化基因的深刻挖掘与时代转化,只有湿润个体精神家园、强化民族文化认同的文艺作品,才能真正深植中国大地、彰显中国国气派。从网络文学《重生潜入梦》将中华

神话、传统技艺融入现代叙事,到安万秦腔剧团《兴汉图》让古老声腔焕发青春活力;从舞剧《青·韵》以数字技术活化木版年画非遗,到《只此青绿》以舞蹈诗剧重构古典美学,新大众文艺以“两创”(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路径,让传统文化在当代语境中焕发新生。

三、技术性为翼:数字赋能提质增效彰显效度

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数字技术的“新质性”效能,为新大众文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动能,重塑了文艺生产、传播、消费全链条。

在创作端,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降低了创作门槛,“人机协同”“AI创意”赋能素人创作者;在传播端,短视频、直播、互动叙事等新业态让作品实现“零时延、广覆盖”,10亿短视频用户、3000万网文作者的规模效应,印证了技术赋能的强大势能;在产业端,微短剧、网络文学、数字IP等形成微型产业体系,李子柒、董宇辉等创作者成为文化符号,既创造了可观经济效益,更成为扩大内需、拉动就业的新引擎。技术与文艺的深度融合,让新大众文艺既满足了人民多样化精神需求,更开辟了文化发展的新空间。

四、渗透性为桥:中国故事走向世界彰显力度

新大众文艺正以其“轻载体、高渗透”的独

特优势,悄然架起一座中华文化出海的“新丝绸之路”。它不再依赖传统的宏大叙事,而是通过年轻化、趣味化、情感化的表达,将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以更具亲和力的方式呈现在世界面前。

在游戏《原神》精心构筑的开放世界里,东方美学与哲学成为可探索、可互动的文化符号;《哪吒之魔童降世》以现代视角重构传统故事,让国漫美学赢得跨文化共鸣;微短剧在海外掀起追剧热潮,普通人的感情与梦想成为打通心灵的通用语言……这些实践表明,有效的文化传播,根植于对人类共同情感的精准把握与创造性表达。新大众文艺正是通过播撒这些饱含中国文化基因的“数字种子”,在全球观众的心里生根发芽,完成了一场场基于共情与欣赏的文明对话。

五、破立并举:推动新大众文艺高质量发展

作为新生事物,新大众文艺在快速发展中也面临成长“阵痛”:内容上“数量过剩、精品匮乏”,部分作品存在跟风猎奇、风格雷同问题;导向上面临算法操控、审美异化风险,“三俗”倾向与“信息茧房”制约发展;保障上存在监管滞后、版权保护不足、基层创作者支持不够等难题。破解这些难题,需坚持破立并举、综合施策。

一是坚守人民立场,推动精品化与主流化。搭建更具可及性的创作平台,形成专业与业余互补的创作格局;建立以“价值密度、情感温度、文化厚度”为核心的评价体系,用好“五个一工程”等评选机制,让“唯质量”成为共识,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

二是深化技术赋能,激活创新力与想象力。推动“文艺+科技”“文艺+生活”融合发展,系统推进传统文化数字化保护;制定人工智能创作伦理准则,引导技术向善,让数字工具成为精品创作的“助推器”而非“替代品”。

三是强化平台治理,平衡价值性与商业性。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建立“价值优先”的算法模型,打破“流量内卷”;完善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微短剧等新业态监管标准,加大版权保护力度,降低创作者维权成本,营造健康生态。

四是加强理论引领,掌握解释权与主动权。深化对新大众文艺规律的研究,构建中国特色文艺理论体系,为实践提供指引,确保新大众文艺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需要文艺大师,也完全能够造就文艺大师!新时代需要文艺高峰,也完全能够铸就文艺高峰!”新大众文艺将文艺创造的“塔基”拓至社会全员,为文艺高峰的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新征程上,当亿万人民既做“剧中人”也做“剧作者”,当人民性、民族性、技术性有机统一,新大众文艺必将成为提升人民文化获得感、凝聚民族复兴力量的重要载体,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谱写更加璀璨的篇章!

(作者为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天津市委党校基地研究员)